

#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特点

###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直到进入近代社会之前，古代中国在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闻名世界的成就。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当世界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开始落后了。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在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但自 18 世纪下半叶即清朝中期以后，中国走上了衰败的道路。经济方面，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方面，清王朝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到了极其腐败、危机四伏的程度；军事方面，清政府已是军备废弛，军力衰败；思想文化方面，清王朝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清王朝已是腐败不堪。在充满竞争的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下，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

1640 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用新的剥削代替旧的剥削。资本主义不但建立在对本

国人民的剥削上面，而且是靠掠夺不发达的国家及殖民地人民而存在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不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马克思也曾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为、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结合在一起的。

正当西方资产阶级迫不及待地要打开古老的中国大门时，英国资产阶级充当了西方列强侵华的急先锋。1840年，英国终于找到了发动对华战争的时机，这就是以保护其罪恶的鸦片贸易为借口而发动的侵华战争——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战争中，虽然中国军民浴血奋战，但由于清政府腐朽昏庸，投降派占了上风，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在英国侵略者的威逼下，1842年8月，清政府同英国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从此，西方列强开始侵入中国，中国也就脱离了由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社会缓慢演变的常轨，开始了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程。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使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战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开始遭到破坏，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外国商品不断涌入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鸦片战争成为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英法两国在俄美两国的支持下，于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同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取得了更多的权益。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

瓜分殖民地的高潮。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历时8个月，清军广大士兵和一部分爱国将领为保卫祖国、维护民族尊严，对凶恶残忍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腐败透顶、昏庸无能，一部分将领又贪生怕死、畏敌如虎，甲午战争终于又以中国战败而结束。1895年4月，清政府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签订了《马关条约》，这是自《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首先，包括台湾在内的大片领土被割占，助长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其次，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要在三年内付给日本赔款2亿多两白银，迫使清政府向列强大借外债，投靠帝国主义列强。再次，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化。

在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在全国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展开反侵略斗争的基础上，1898年爆发了义和团反帝运动。这场运动首先在山东，接着在华北、东北等地区自发地开展起来，到1900年形成高潮，发展成为遍及北方，波及全国，震动世界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阻止和打乱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计划。列强为保护并进一步扩大各自在中国攫取的既得利益，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1900年6月，由英国、俄国、德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组成的八国联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虽然义和团和清军爱国官兵对八国联军进行了顽强抗击，但是，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却实行投降卖国政策，致使八国联军先后侵占天津、北京。1901年9月，清政府同参加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并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共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条约，帝国主义进一步在

中国设立军事据点和占领区。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驯服工具。《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已全面控制了清政府，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统治秩序被完全确定下来。至此，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恨终生。

## 二、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

###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经济结构逐步发生质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从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单一结构，演变为封建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但已开始渐趋破坏，以至趋向瓦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迅速出现，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的发展；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形成；外资企业与中外合资企业不断增加。这是一种多种经济成分与不同经济势力并存的混合经济结构。

（1）趋于解体的自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中国社会进入近代阶段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并渐趋瓦解。尽管这一趋势处于初级阶段，变化的速度十分缓慢，然而，它还是突破了两千多年来的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框架。由于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是相当缓慢的，因而自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

（2）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有一定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入

侵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这其中包括：商品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扩大，资本积累的相对集中，大机器生产方式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催化作用。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引起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新变化。19世纪70年代初到甲午战争前的20多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是十分小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发达，造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和软弱。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不能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轨道。

(3) 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初步形成。中国官僚资本源于洋务派官僚兴办的官办企业。19世纪60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产生了中国最早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洋务运动中的某些官员，日后演变成了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家。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些北洋军阀与官僚控制了一些矿山企业，使之成为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这个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尚没有同国家政权结合，也还没有形成对国民经济的垄断。

(4) 外资企业出现并有了一定发展。外资企业是随西方列强的入侵及通商口岸的开放而陆续出现的。甲午战争前，尽管西方列强还无权在中国设厂投资，但他们却已经开始输出资本，在华设立企业。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华设厂“合法”化了，外资企业明显增多。同时期中外合资企业也迅速增加。当然，列强是以合资的形式兼并和控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 (二) 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1) 传统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向地方割据、军阀统治过渡。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过程中，清政府将中央权力逐渐下移

到地方实力派手中。最先是曾国藩集团成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曾国藩则成为近代中国军阀的鼻祖。后来的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人，均仿效照搬，集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这样就使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逐步向地方割据的军阀统治过渡了。

(2) 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西方列强尽管先后对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两次占领清王朝的首都，逼迫清政府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加上列强之间矛盾重重，使得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在这种形势下，列强便走上了利用清王朝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的道路。清王朝统治集团则为维护其统治地位，自然投靠了帝国主义。于是中外反动势力便紧密勾结在一起了。

(3)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尝试与破产。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出现了一批要求广泛学习西方，改革经济、文化、军事、政治，让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最重要的政治主张是要求以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代替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这是封建顽固势力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改良派的变法自然以失败而告终。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探索和尝试，走上了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为目标、以暴力革命为手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然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逼迫下，近代中国试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尝试遭到了又一次的失败。

### (三) 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

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变化，主要是中国的文化已不再是单一的文化结构了。

(1) 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涌入，产生了中西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

播，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与引进，既使得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也使得依赖传统文化的传统政权权威面临威胁。尽管封建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极力阻止西方文化的传播，终究无济于事。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这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运动的一次升华，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文化观的基本特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比改良派更进了一步，提出要学习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

(2) 反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并没有能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彻底摧垮封建主义。这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思想文化的重要性。于是，他们试图从思想文化的高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

### 三、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第一，帝国主义列强逐步成为统治中国、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60年间，列强同中国订立了300个左右的不平等条约（包括章程、合同或专条）。列强从中国勒索赔款10多亿两白银；强迫中国开放50个通商口岸；除割让台湾、香港、澎湖等地外，俄国鲸吞14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列强在中国17个城市划定数十个租界；外国人掌握了中国海关；列强取得任意进出沿海口岸及内河航行权；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派驻军队，直接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列强垄断了中国的内外交通，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并在中国各地办工厂、开商店、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开设银行、发行钞票，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此外，列强还

利用开办学校、发行报刊、传教、举办慈善事业等方式进行精神渗透和文化侵略。这样，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深深打进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牢牢地控制中国，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独立发展的首要力量，也成为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

第二，中国封建势力已经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成为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近代中国的社会基础。以清王朝封建专制政权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对内残酷地统治人民，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反动、最黑暗的势力。

第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中国已经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但是，西方列强出于长期剥削奴役中国的需要，宁愿保留中国社会的封建剥削关系，而不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这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同买办资本的剥削和城乡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仍然占着明显的优势。

第四，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发展道路艰难，力量软弱，始终都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第五，中国在实际上长期没有实现统一，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上表现为极端不平衡。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实行分裂剥削的政策和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造成的。

第六，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工农群众日益贫困，过着饥寒交迫、毫无民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

## 第二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

### 一、农民革命的终结

鸦片战争后，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造成大批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破产，中国人民特别是南方各地群众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另一方面，清王朝又把多次战争失败的负担转嫁给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加重了对农民的搜刮。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从而使国内阶级矛盾，尤其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两万余群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洪秀全正式称天王。攻下永安后，天王下诏封杨秀清等为王，同时制定各项制度。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江南重要城市、两江总督府所在地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至此正式建立了一个与北京清政府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于1853年5月先后派出部队进行了北伐和西征，使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达到全盛时期。这一年，太平天国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从千百万在封建桎梏下的农民的要求和愿望中提炼出来的，是农民革命战争宝贵经验的总结，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已从反满的民族革命跃入了反封建的社会革命。

1856年8月，正当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处于高潮的时期，太平天国领导层发生了一起由东王杨秀清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而引起的内讧。洪秀全虽然最终平息了这场内乱，但是，这一事件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事变后不久，清军乘机反扑，再度形成对天京的包围，太平天国形势开始逆转。为了挽

救危局，洪秀全提拔李秀成、陈玉成等一批青年将领，重建太平军领导核心，同时由洪仁玕总理朝政。洪仁玕为了挽救革命危机，向洪秀全提出全面振兴太平天国的救国方案——《资政新篇》。洪秀全采取的这些措施，终未能阻止太平天国形势的逆转。

1864年7月，清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最后失败。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持续14年，纵横18省区，声势之浩大，为中国和世界农民战争史上所仅见，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高潮，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动摇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它英勇地抗击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国家主权；它还对近代中国的出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英雄们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榜样和鼓舞力量。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最终悲壮地失败了，它的失败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从客观方面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发生在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它所面临的敌人是强大的。不但有掌握全国政权的封建地主阶级，而且还有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支持这个政权的外来侵略者。他们结成反革命联合阵线，共同残酷地镇压了这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从主观方面看，太平天国仍然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的农民战争。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作为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其落后性、分散性和狭隘性必然在革命过程中反映出来。这些局限性就使他们不能制定出正确的革命纲领、路线和政策，不能彻底摧毁封建制度而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只能因袭旧制度；他们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纪律，保持内部的团结统一，起义后避免不了封建化的结局，最终导致自相残杀的悲剧；他们虽然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是对侵略者的本质却缺乏认识，甚至错误地把信奉基督教的侵略者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和朋友。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说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农民阶级的局

限性决定的。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压迫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革命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广大农民参加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但是，即使像太平天国这样伟大的农民革命，没有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反侵略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并且也不可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农民革命的终结。

## 二、改良主义的失败

19世纪70至90年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反映正在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维新思想。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主张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谋求国家富强，把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主张改革封建政治，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符合时代的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反侵略反封建的作用，对于开通社会风气也具有启蒙作用。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宣传，为后来康有为等人掀起的维新运动准备了条件。

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在艰难的环境下有了初步发展。逐渐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并使自身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早期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

张，所以也被称为维新派。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成为政治运动，是从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开始的。1895年春，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在京的举人积极行动，纷纷以省籍为单位到清政府都察院上书请愿。康有为便在这时发动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上书中陈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坚决反对割地赔款，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并提出了在“富国”、“养民”、“教民”三个方面变法维新的具体建议。这次上书，虽然因顽固派官僚阻挠而未能送到光绪皇帝手中，但它广为流传，产生了实际影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成为政治运动的起点，揭开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标志着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登上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

为了把变法维新运动推向高潮，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后继续上书，进一步阐述维新派要求弃旧图新的基本纲领，其主要内容是：政治上，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兴办实业，发展民族工商业；思想文化上，倡西学，兴学堂，开发民智。这些主张，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特别是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挽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经济的两大愿望，符合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方向，有着重要的开拓性意义。维新派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加紧对变法维新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积聚力量，广造舆论。

从1895年下半年到1898年初，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和上海组织学会、创办报纸，所办《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严复在天津创办报纸，成为在北方宣传变法维新的重要阵地；谭嗣同在湖南成立学会，创办报纸，宣传维新思想。这样，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地主要城市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已迫在眉睫，警告光绪皇帝若不及时变法，革旧图新，“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898年1月，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进一步规劝光绪皇帝厉行变法。康有为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这封上书是维新派的施政纲领，集中反映了维新派要求参与政权的强烈愿望和改变现状的全部要求，其核心内容是在皇帝的支持下，使资产阶级改良派得以参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关，推行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各项新政，从而建立一个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国家。同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又联合一些地区的学会，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组织准备。

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推动下，为了摆脱处于无权的傀儡地位，决心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这次变法从6月11日起，至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共103天，因此又称“百日维新”。

6月11日，光绪皇帝第一次召见康有为，商讨确定变法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方面，设农工商总局，民间允设农会、商会，提倡实业，保护农工商业，奖励创造发明和制造新器具；设铁路矿物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藏；设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整顿厘金；取消旗人特权，鼓励其自谋生计。政治方面，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广开言路，并准许各地开设学会和报馆，给出版与言论以一定的自由；取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删改则例，澄清吏治。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设经济特科；创设京师大学堂，同时命各地书院改为学堂；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考察。军事方面，裁绿营，练新军，添设海军；培养军事人才，并筹办兵工厂制造新式军械弹药，准

备按西方兵制实行征兵制。颁布一系列革新政令的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使国家臻于富强。

尽管上述新政措施大多是一些具体的改良性的措施，但它毕竟对清王朝腐朽的封建统治的诸多方面有所触动，因而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能容忍。地方官员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外，均置若罔闻，推诿敷衍。在中央政府，新政机关基本上被顽固势力所左右，大都有名无实。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重新临朝“训政”。随后，又下令捕杀在京的维新派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香港和日本。谭嗣同曾有机会逃走，但他坚持不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者，而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表现了维新志士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9月28日，谭嗣同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称“戊戌六君子”。参与此次变法的官员相继被革职、流放或判刑。新政措施除设立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仍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

第一，这场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的伟大爱国救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救亡立国作为变法的动因，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代表了为争取民族独立、摆脱列强殖民奴役而斗争的进步力量。他们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主张变法图强，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促进了民族觉醒。这样，以救亡图存、变法图强为目的、以政治改革为核心，涉及思想、文化、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变法维新运动便成为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

第二，这场维新运动是一次试图进行全面革新，从而把中国引上近代化之路的社会改良运动。为了救亡图存，变落后的古老中国为先进的近代化强国，维新派试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领域进行全面革新。

第三，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变法维新运动中，维新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学说和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为武器，对中国传统的君权观念、伦理纲常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正是由于经历了维新运动浪潮的冲刷，中国的思想界开始从僵化封闭状态下摆脱出来，开启了国人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热情，从而激发人们挣脱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禁锢，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得到空前的传播，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

当然，这场维新运动的失败也不是偶然的。它的失败，就其客观原因而言，是由于当时清政府内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不但掌握着中央最高统治权，而且控制着中央及地方的政权、军权。而维新派所依赖的光绪皇帝没有实权，并不掌握军队。这样，封建顽固势力就可以对维新运动进行阻挠、破坏直至把维新派置于死地。

从主观上看，则是由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软弱的资产阶级及其早期政治代表即改良派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导致的。在这方面，这场维新运动提供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一，维新派没有认识到必须与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根本决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 19 世纪 70 年代产生到甲午战争后虽有一定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初步的，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而且从地主、商人、官僚中转化来的新兴资产阶级维新派同封建地主关系极为密切。维新派在变法的整个过程中，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甚至企图在旧制度的基础上，依靠同样也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但又毫无实权的皇帝，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是行不通的。

第二，维新派一个致命的缺陷是完全脱离群众，缺乏群众基础。维新派先天不足，没有真正实力。但是，他们在变法过程中却始终脱离人民群众，害怕群众“揭竿而起”，甚至仇视农民革

命。在维新运动的纲领中，缺少解决农民问题的内容和政策。这样，维新运动只能限于少数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势单力薄，当顽固势力进行反扑时“无力回天”，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

第三，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认识不清。维新派对帝国主义心存幻想，甚至错误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愿意瓜分中国，而是希望中国振作起来，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抱着这样的幻想，当然不可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后，曾要求日本统治者出面挽救中国的维新事业，就是一个证明。

总之，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充分表现了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主义运动同样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不能把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事业引向胜利。

### 三、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走不通

清朝统治集团为了从严重的危机中解救自己，开始改变统治策略。1901年慈禧太后一面下“罪己诏”，一面开始推行包括废除科举、设学堂、提倡出国留学、奖励私人兴办工商业、改革军制、编练新军等内容的所谓“新政”措施。顽固派推行“新政”，原是为了缓和舆论，延长自己的统治寿命，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随着一项项“新政”的推出，清政府自身的对立物一个个制造出来。其中奖励私人兴办工商业的“新政”，使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力量进一步扩大，为20世纪初期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全面展开奠定了阶级基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

青年时期的孙中山受改良主义思想影响，曾在1894年初上书李鸿章，希望李鸿章能采纳他的主张，以西方国家为楷模，改革封建的教育考试制度，改良农业生产，发展近代工商业，使得“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李鸿章根本没有理睬孙中山的改革要求。随后，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又一次暴露了清朝统治者的反动和腐败无能。活生生的现实，使孙中山认识到依靠清政府自身进行改革以求富强是不可能了，必须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从此，孙中山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1894年11月，孙中山联络华侨，在檀香山组成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孙中山草拟了《兴中会章程》，以“振兴中华，维护国体”作为立会宗旨，并规定了管理方法和组织原则。孙中山还为兴中会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清朝专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兴中会的成立，表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组织上已初步形成，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端。

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初初期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式知识分子群。章炳麟、邹容、陈天华就是这个群体的优秀代表。在他们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革命刊物和革命宣传品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新式学校、新军和中小知识分子及下层群众中广为流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为同盟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继兴中会之后，20世纪初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如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光复会、岳正会、励志学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纷纷建立，为建立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作了组织上的准备。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提出成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倡议，得到黄兴、宋教仁等多数人的响应。随后决定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各革命团体，成立统一的革命组织。7月30日，各革命团体的代表在东京召开筹备会议，决定将准备建立的统一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明确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